

李克强到长葛河南鲜易控股公司考察

李传金 杜文育

2015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许昌市知名企业河南鲜易控股公司考察，他对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从一家生猪屠宰生产商转型为生鲜供应链集成服务商很感兴趣，听得仔细，探出究竟，提出希望，对河南食品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十分赞赏。

他非常关心公司在互联网+应用落地情况，他对河南鲜易控股公司利用互联网开发冷链物流表示认可：“利用互联网，把全国的冷链资源联网起来，就能把闲散的资源进行集约，生产效益提升了，提高效率就能减少损耗。”

他对河南鲜易控股公司采取众筹的方式，发展冷链物流给予肯定，更对公司开展以众创的模式发展公司业务提出很高的期望，他说：“大企业的双创大有可为，空间无限，你们的创造力是把更多的人集中起来，迸发的智慧和能量对企业帮助更大，但是你们要跟小微企业结合，有些你可以委托给小微企业，带动小微企业共同发展。”

食品安全也是总理十分关心的话题。当得知河南鲜易控股公司拿出企业销售的3%，投入到了食品安全管理之中，十分赞赏。对企业主动升级作为，十分欣慰。

利用互联网，把全国闲散的冷链资源网联起来，集约起来，提高了效率就能减少损耗，生产效益就提升了。

下午3时整，李克强总理一下车就直奔河南鲜易控股公司展示大厅。公司董事长朱献福介绍，公司从一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做起了产业互联网，已转型成为B2B生鲜品供应链电商，叫鲜易网。目前鲜易网已有3万用户，今年的交易额已达32个亿。

当总理得知公司已从生产企业转型为服务企业，实现了产品+服务的产业融合时，他说：“产品+服务，线上+线下，这样就O2O了。”

当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冷链马甲的页面时，总理听取介绍，当知道这个冷链马甲是一个冷链资源交易的公众平台，把全国的冷藏车、冷藏库及冷藏的

数据聚集到一起时，总理领会了平台的价值：“把冷链的设备、冷藏车都集中到一个平台上，给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有需求在这上面，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了。”

总理又问：“把全国的冷链资源都集中在这上面，进行联网，利用 GPS 技术实现信息交互？”

“是的。利用 GPS，还能监控车辆的湿度、温度，并对车辆进行定位。目前的空车率降低到 10%，还能把全国的冷藏库空库率降低到 10%，综合交易效率也可以提升 10%。”朱献福回答。

李总理表示，利用互联网+，把闲散的资源进行集约，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生产效益就提升了。

总理看到河南鲜易控股公司转型，紧紧抓住食品安全底线，探索出了新的服务产品与服务模式，大为赞叹：“我看到河南食品企业有很大的提升，很大的变化。”

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作为一家食品屠宰企业，能够快速抓住互联时代的成长机遇，在探索互联网+现代农业服务上迈出了成功的步伐。

公司现在开始协同制造了？这是总理关心的问题。朱献福介绍，公司已经实现了 C2B 的协同制造，只要客户有需求，公司都能够从生产加工，到流通加工，已经实现定制化。

朱献福向李总理介绍，为保障食品产业链安全，他们开发了标准技术系统平台，依靠安全技术打通了产业链的任督二脉，把一产和二产结合起来、把二产和三产结合起来，就是个标准系统，利用这个系统来保证食品安全问题。

总理赞叹地说：“企业主动做好食品安全监测，这个好！”总理还问河南鲜易控股公司每年投入多少资金维护食品安全的问题，当得知食品安全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 3% 时，很是放心。

在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产品展台前，李克强总理看得仔细。他对河南鲜易控股公司开发出这么多自主品牌，还做代工，并为三全、思念的产品也提供冷链服务很满意。总理感慨地说：“河南的食品企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很大的变化。”

“让司机做股东，这就是众筹呀。众筹还在发展当中，我们要给它一定的成长空间。”

在公司物流广场，司机白丽景向总理问好。白丽景是中国十大好司机，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李克强总理有力地握起他的手，

表示慰问。并关切地询问他，跑空车吗？空驶率有多高？

白丽景表示，空驶率很低，不到10%，这些车都安装GPS，到哪里都有货源。货没卸完公司已经将指令发给他了，一般很少有时间间隔，因为提前已经将货安排好了，车没到，去哪个地方，电脑已经安排好了。

总理的回答让白丽景大受感动。总理这样对他说：“好。希望你们为千家万户送去健康！”

白丽景虽然是中国好司机，却是公司加盟车主刘军伟聘请的师傅。当总理听到加盟车，很是疑惑。

原来，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为满足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采取了一种融资租赁的方式，有意愿与河南鲜易控股公司合作发展的司机出一部分钱，公司拿出大部分钱，双方合资购买冷链物流车，配送收益双方按出资比例分成。这样司机也变相成为公司的小股东了。

刘军伟向总理介绍：“我出资占四成，公司出资占六成，共花了近70万元买了这台物流车。一年成本就收回来了。”

总理对刘军伟说：“双方出资买车，这正是众筹的方式呀。”总理握着刘军伟的手说：“小老板呀，厉害！”

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介绍，目前，公司以众筹的方式加盟到公司车队的车辆达四分之三，共有2000多名司机入股。

显然，总理看到众筹的社会效益。他对随从的工作人员说，众筹在发展当中，要给它一定的空间。

大企业的双创大有可为，空间无限，你们的创造力是把更多的人集中起来，迸发的智慧和能量对企业帮助更大。当然，还要带动小微企业发展。

其实，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不仅以众筹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公司运营，其实，他们在公司运营的各个层面，还有300多个小的创新体，也叫创业团队，公司同样采取股份合作的方式，让这些骨干员工成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一起创业。

李克强总理得知，河南鲜易控股公司还有这么多众创空间，很关心在众创空间的运营。“在这些众创空间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很高，甚至不需要公司管理。解决方案产生了效益，个人留成50%。”朱献福说。

李克强总理对在场的河南鲜易控股公司工作人员说，这就说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事，不单是小企业的事情，大企业也可以开展双创，大企业集聚的能量，可能比小微企业散发起来还要快，还要强，还要大。

他说，大企业的双创大有可为，空间无限，要把更多的人集中起来，迸

发的智慧和能量对企业帮助更大，但是要跟小微企业结合，有些可以委托给小微企业，带动小微企业共同发展，咱们大企业和小微企业应该并肩同行，一起支撑中国经济的蓝天。

河南鲜易控股公司改变了组织结构，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世界潮流，你们是时代的弄潮儿。说明你的是新业态、新模式，是很有潜力的。

李克强总理对河南鲜易控股公司采取众筹与众创的方式改变公司的生产方式、研发方式和管理方式大加赞赏。

他对朱献福说，员工不再是你的雇员，而是企业的拥有者，这样就能够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成为公司的创造者，这样实际上也改变了公司的内部结构。

朱献福向总理介绍说，河南鲜易控股公司不仅公司内部创业，还让上游、下游的利益相关者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创业。实际上，他们尝试了用科学技术与组织管理创新，实现了企业传统治理方式向更具现代治理理念的模式转变。

李克强总理说：“你们新的组织结构的变革是世界潮流，你们是时代的弄潮儿。说明你的是新业态、新模式，是很有潜力的，而且很可能超过老的业态。”

习仲勋同志在长葛

张继增

习仲勋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于1961年4月初来到长葛搞调查研究，于同年8月底离长返京。时间过去已9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不少事情发人深思，很受教育。

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来长葛时没有乘坐小轿车，也没乘坐吉普车，而是集体乘坐一辆中型客车。县委介绍情况和汇报工作后，习仲勋同志满面笑容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而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

中央工作组成员有：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曾一凡（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国务院副秘书长）、李孟夫（国家事务管理局局长）、侯亢（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金树旺（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黄仁（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田方（办公厅秘书）、张云（女）（习仲勋同志的秘书）、朱斌（曾一凡同志的秘书）、张某某（办公厅秘书），还有一些同志已回忆不起姓名了。从工作组的阵容，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决心。有一次习副总理和两位副秘书长研究工作，议论到这次抽干部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时，习副总理说，有的部门对抽人下基层不是那么积极，总是强调工作多，事情忙，抽不出人，其实这是最大的误会，如果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到有问题的地方去、深入到有经验的地方去，怎么能够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怎么能够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些什么要求，意见和建议？又怎么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国务院机关这次决心下来搞调查研究，我看只会推动工作，这一点对长葛县委以很大启示，当时县委的领导同志，包括第一书记张汉英同志都立即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去了。

习副总理的工作很繁重。省委吴芝圃同志，地委赵天锡同志不断来长葛向他汇报工作，长葛县委遇到关键问题常常向他请示。调查组自身的调查研究任务又很繁重，但他总是利用傍晚沿清潩河岸散步的机会，在田间地头和社员们交谈。他利用不少晚上的时间深入到王庄村、宗寨村，到农民家走

访。我随他这样地走访十次之多，他每次到王庄或宗寨去总是步行，从没有乘坐过汽车。到农民家里，他每每不是随手拿个小板墩坐下，就是很随便地坐到砖头或石板上。他曾对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讲，下去搞调查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给农民谈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得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方设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副总理心里时刻想着群众。他曾对两位副秘书长这样说过，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舒畅。

习副总理批评机关乱圈土地、县城内乱修大马路是“与民争利”。他说，县城人不多，修那么宽的大马路干什么，要尽快毁掉让农民还耕，将来需要可以再修，要为群众行方便。现在的文化路和建设路当时就交还集体开垦还耕了。群众对此非常高兴。

习副总理对在困难的情况下搬迁县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办什么事情要根据情况和条件，要考虑到群众的意见和情绪，要考虑到合不合乎政策，不要办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反政策的傻事和蠢事。在生产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你们搬迁县城大兴土木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的县城不搬，难道县委就不能正确领导吗？我看你们新盖的礼堂不比国务院的小，比政协的礼堂还大，难道有必要吗？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材用于群众的生产生活，那才是必要的。

习副总理对弄虚作假、华而不实、摆花架子、虚张声势非常讨厌。有一次他到增福庙公社视察工作，途经孙庄村东，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学生打着红绿彩旗，呼着口号，拿着盆盆罐罐在那里抗旱浇麦，习副总理对随行的县领导说，这是有意做戏给人看的，影响教学和学习，这种人为的形式和声势是很不好的，是非常脱离群众的，你们县委应该追究，进行批评，令其纠正。

工作要有布置，有检查，要落到实处。县委发出抗旱浇麦的通知后，习副总理亲自在县城周围进行检查。当他发现县木材公司大门口一眼水井没有投入抗旱时，非常生气。恰好这时有几个青年女同志在大门口说说笑笑。“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抗旱浇麦？”“领导没有给俺布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叫习仲勋，是从北京来的。”我立即介绍说：“这是国务院习副总理，回

去告诉你们领导，要赶快行动起来。”“县委有号召，你们要再不响应，抓紧行动就更不对了，明天我要来检查。”翌日下午，习副总理果然又来到这里，看到木材公司的同志们把门口那眼水井利用了起来，非常高兴，并亲自和木材公司的同志们一起推起水车来。

习副总理在县委机关，曾数次召开基层干部和老农座谈坐。他对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非常热情，请茶让烟，谈笑风生。茶叶、纸烟和水果都是习副总理自费置办的，从不让县委用公款招待。

（此文写于1970年，作者张继增当时任中共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后任郾城县委书记）

习仲勋书记给八七村党支部和 全村干部群众的信

中共长葛县委请转城关镇八七村党支部的同志们和全体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来二十五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

习仲勋给八七村复信经过

郭伟年

一九八四年九月，八七村党支部副书记李长庆和主任郭俊亭找我说：一九六一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曾到八七村（当时为宗寨村）进行过调查。八七村是作为“由富变穷”的后进典型被调查的。二十五年过去了，八七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取得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又成了“由穷变富”的先进典型。村干部想把这一巨大变化，向习仲勋书记汇报，争取得到这位老首长、老领导的指教。

说明来意后，我即应允。并开始收集材料。于九月二十日，由我执笔，给习仲勋书记写了封约 1900 字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汇报了该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情况。当年，全村实现产值 354.5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359 元。这在当时属全县的富裕村。

时隔一个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习仲勋书记复信，对八七村由穷变富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收到习书记的回信，八七村党支部和干部群众倍受鼓舞。遵照习书记的指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全村深化改革、干事创业的劲头更大更足了。我又写出了《八七村由穷变富走上康庄道，习仲勋欣然提笔复信祝贺》新闻稿件，先后在《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作了报导。

（作者郭伟年：曾任长葛市文联主席）

习仲勋副总理在王庄村调研

1961年4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率中央工作组到长葛县进行蹲点调查研究。工作组到达长葛后选择和尚桥公社的杜村寺村、宗寨村（现八七村）为重点调查对象。4月13日，工作组即到王庄村访问并查看小麦生产状况。15日上午9时，习副总理和中央工作组的同志在中共长葛县委副书记张继增、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杨双成、副书记楚西有、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水木等陪同下来到王庄村查看群众生活情况。当时习仲勋副总理身份公开化，身边只有工作队田方秘书陪同。当时正值群众集体下田干活时间，村里闲人很少。习副总理年有50，个子1.78米，身着灰色中山服套装，体型偏胖，短发背头，面带自来笑容，说话不拘言辞，声如铜钟。

1958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同年5月成立“五四集体农庄”，办公地点设在宗寨村（现八七村），王庄村归属“五四”集体农庄。农庄内实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干活，统一休息，统一吃饭，统一调动，统一指挥。同年10月26日农庄一声令下，王庄村群众限一日内全部迁往宗寨村居住。王庄群众扶老携幼，丢其所有，按时完成了搬迁。之后由于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极左思潮的影响，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王庄村迁往八七村后，村里房子无人看管，人为损毁严重，家具被随便拉走搞大炼钢铁。1959年底王庄村群众按上级要求又从八七村搬回原地，但这时家家产户基本的生产、生活用品、用具基本全无。不久，村里公共食堂也因缺粮面临断炊停办问题。1960年春，广大群众开始吃树叶，挖野菜，剥榆树皮吃，不少人患上浮肿、大肚子病，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增无减。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管理条例》（简称“十二条”），要求彻底纠正“五风”错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王庄村公共食堂于当月停办。

当习副总理来到王庄东街一队时遇见老农张来头，习仲勋副总理主动上前同张来头热情握手，亲切询问其生产、生活和健康情况，显示出国家领导人处处关心人民群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风范。随后又主动要求到

家里看看，于是张来头便带习副总理一行到其家里。

张来头年已 70，身体硬朗，祖孙三代共 8 口人，家有三间破茅草房，一个小厨房，和大多数人家一样没有院墙，屋内放着两张木床，另有一个地铺，正中间放一个小方桌和自己用旧木板钉的三个小木凳子。虽说用品用具简陋，但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习副总理同大伙一同走进张来头住的屋里，张来头很是热情，好像有很多心里话要对习副总理说，但又有点拘谨，很不自然，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俺农村赶不上城市，条件差，不但没有礼物招待大家，连坐的凳子都没有。”习副总理急忙打断张来头的话，说：“不用客气，我们是自家人，不需要招待，大家随便坐。”但一个人也没坐。这时候习副总理拉着张来头的手说：“不管他们，我俩坐下。”遂和张来头一块坐到小方凳子上。随后便问：“家人都好吧？小孙子们都上学了吧？”张来头连连点头说：“对，对”，“你们家里过去一直是这样吗？连一件大的家具和用品都没置买？”习副总理接着又问。张来头当即回答，并且情绪有些激动：“我们家原来有些家具，因为一年前俺村搬迁到宗寨住，房子小，没处放，后来全丢失了。”接着习副总理又问：“我听说村里食堂停了，你认为是继续办下去好，还是停下好？”张来头回答：“虽说粮食少，但是停了好一些，各家可以随便自行调配……”。最后，习副总理说：“我知道群众生活比较艰苦，需要我们上下一盘棋，共同努力，我想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

从张来头家出来，习副总理一行从王庄东街到西街，一路细细查看群众住房情况，不时向随从人员发问。上午约 10 点 40 分，习副总理一行返回县政府。

4 月 16 日，习副总理的办公地点就从县政府搬到县邮电局（现长葛市邮政局）。4 月 17 日上午，习副总理召集王庄村主要干部和群众代表在他的办公室开座谈会。王庄村参会人员有：王水木、王龙泉、张来头、王红恩、李留昌、张建业、陈明善、张连庆。座谈会开始，习副总理讲话：“今天请大家来，想专门谈谈你们村的事情。我知道干部和群众一样生活很苦，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的，也有人为的，主要责任在县上，当然，中央和我都有责任，今天就请大家过来共同商讨今后如何办，请大家发表看法。”良久，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无人作声。习副总理接着说：“我看应该由县里处理，应该保证人人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被损坏的房子要给以合理赔偿，没房子住的县里要负责安置住房，想办法把丢失的家具找回来。特别是要把被损坏的房子和没住房的名字统计一下，要马上解决。”随后又让大家

发表意见，但大家都不作声，只是互相面带微笑，窃窃私语，赞许习副总理处理事情的果断风格。约10点40分，座谈会草草结束。

4月18日下午，王庄大队接到县委曾秘书长的通知。次日上午，大队组织人员由曾秘书长带领到县直各机关寻找因村里搬迁而丢失的东西。先到县政府和县委机关，结果一上午什么东西也未找回来。这时候凡参加寻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想法：那些年份我们的东西明明是“五鬼分尸”，往哪里去找？下午田秘书长又要求大家到邮电局集中开会。这次习副总理因忙未到场，由曾秘书长主持。会上曾秘书长说：“习副总理对上年的寻找工作很不高兴，并且批评说，像这样的工作效率，这工作到何时才能完成？希望大家要多动动脑筋，放活点，要求大家19日上午继续寻找。”会议简短扼要，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在王庄大队支部书记王水木的带领下，会议结束后这些人员并未回家，直奔大队部会议室开会，就今天的事进行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理解习副总理的良苦用心，一定要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19日上午，寻找工作继续，村里参加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几个年轻人。寻找组仍由曾秘书长带领，首先进县政府，然后到政府机关食堂餐厅，一眼看到大厅一头拐角处放着几张旧餐桌和几条凳子。当时李红恩说：“这不是咱们大队原来的办公桌凳吗？抬走。”曾秘书长发话，年轻人二话不说抬上就走。接着又有人说：后边我看见有两个水缸，这是一队张××和李××家的。年轻人遂抬走装车上。最后来到县政府后院，发现厕所旁堆放着一堆旧房檩条，当即就又有人说：“这不是拆三队王××家房子的檩条吗？抬走。”后又相继来到县委机关院、财贸委办公楼院、公检法机关院（当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在公安局一个大院办公）、县委招待所，找回了不少丢失的家具、用具。根据习副总理的意见，凡寻找回来的东西都及时分给了村里困难群众。

4月28日上午，王庄大队又接到县里通知，叫大队主要干部到邮电局开会，参加人有王水木、李留昌、张连庆。会上田方秘书讲：“习副总理要我告诉大家，他已和县里协商妥当，凡是各机关大院的空闲地和大街两侧土地，王庄群众都可以种庄稼，大家现在就可动手。”“五一节”过后，县里陆续给王庄村拨救济粮8000斤，救济款4000元，分配给生活比较困难的农户。5月15日又把王国记、冯根成、张清林、桑彦彬、张小明、张申妮、陈根、张明申、张富贵九户没房子住的分别安置到县服务公司（现房产局院内）和碗场（现盐业公司院内）的公房里居住。至此，王庄村群众的生活和住房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1962年10月，习仲勋副总理委派其侯宾秘书长微服回访王庄村。此次回访没告知长葛县政府，也未通知王庄大队部。被回访人是1961年习副总理在王庄村第一次走访人张来头之子张明仓。张明仓告诉侯秘书长：王庄村里每人分给三厘菜地，还正在准备借给每人三分土地让其自主经营，这样以后生活就不会有问题了。侯秘书长听后非常高兴，最后鼓励张明仓努力干，困难很快就会彻底解决，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对习仲勋在长葛的回忆

孔宪瑞

1961年4月初，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到长葛搞农村工作调查，当时正是反“五风”的后期，由于“五风”的错误，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我任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一天在县委机关向习仲勋副总理和中央工作组的全体同志汇报和尚桥公社情况，当汇报到农村生活困难，群众吃不饱饭患浮肿病，有不少妇女患子宫下垂病，并分“几度几度”的多少时，习副总理说：“农村有没有仪器？怎么知道几度啊？只要说明妇女患子宫病的有多少就行了。”汇报后习副总理讲：“这次中央派我们来搞农村调查，是贯彻人民公社60条等工作。”当时研究确定宗寨、王庄、樊楼、杜村寺大队为调查点，以此展开工作。习仲勋带领工作组，搞调查5个月，他们艰苦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朴素的工作作风，同干部群众的融洽感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按照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在人们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例如农村食堂办不办，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农民口粮标准很低，一人一天只有五六两，吃饭分级定量，群众普遍吃不饱饭，患浮肿病的人很多，群众有气不敢说。当时把农村食堂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吃饭不要钱是供给制，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因而谁也不敢说食堂不好。谁要说食堂不好，就要受批判，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针对这一事实，习副总理逐队逐户进行调查、座谈、征求群众意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得出结论：办食堂口粮低，困难多利少弊多，还是不办为好，同意解散农村食堂。解散食堂在当时是件天大的事情，挽救了许多群众的生命。当时群众流传着一句话，食堂不解散，生命难保全。足知解散食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纠正了以公社、大队为核算单位，搞平调吃大锅饭，取消按劳分配的极左作法，对大队、生产队的规模进行了调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土地、牲畜、农具等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田间实行地段包工的生产责任制，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群众情绪高涨，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较有效地控制了平均主义，克服了“五风”错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

时习仲勋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离开按劳分配的原则，急于搞穷过渡，搞平调，刮共产风，脱离了实际，违背了群众意愿，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而生产搞不好，生产力遭到破坏，收入下降。‘五风’的错误教训，广大干部群众吃的苦头这么大，是够深刻的，应认真总结，接受教训。”他还讲：“农村各项工作的最终归宿，就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多打粮食，群众收入增加。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效的制度建立好，才能巩固。”现在回忆起来，他的对极左错误抵制思想路线，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生活的恢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习副总理工作作风非常朴素，平易近人，经常步行深入群众座谈情况，关心群众疾苦，体察民情。一次同王庄农民座谈，一老农民说：“农民以种地为生，现在地少了，无地了，怎么生活？”他听后就考虑这个问题，县、公社机关占了他们几百亩地，农民生活现在这样苦，口粮不够，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于是就动员县、公社各级领导将机关、工厂、大街没搞基建的土地退给农民，先耕种，恢复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生活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是关心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是对土地的珍惜爱护。我记得深刻的一次是，习副总理单人步行到公社，同我谈工作情况，他说：“前几年刮‘共产风’，有不少干部犯了‘五风’错误，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就好，把60条认真贯彻落实，农村形势很快就会好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好起来”。他还谈到：“一个公社几万口人，当个公社书记责任大，担子重，要切实把工作搞好，领导要有民主作风，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当班长，要抓大事，整天忙忙碌碌的，当事务主义领导不算好领导。抓大事就是要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群众思想动向要掌握，经常深入调查研究，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不要个人说了算。”他的话给我启发很大，在以后的实践工作过程中不断对照检查和运用。老一代的这种革命精神和传统作用对我们现在的党员干部是有教育意义的。

按：“五风”是对1958年到1960年间农村极左路线和恶劣工作作风的概括，一般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共产风”“浮夸风”为祸最烈。

——“五风”是在1958年的中国，看似到处一派艳阳天的“大好形势”下，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作出误判，提出“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和目标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的。

——“五风”延续了战争年代思维方式，过高估计和无限夸大了人的

作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低估人的价值，与神圣目标相比，什么都能牺牲，对生命缺少应有的尊重。

——“五风”是对科学的反动，对自然、对规律缺少起码的敬畏。从愿望出发，不尊重自然规律，不尊重经济规律。

——“五风”也是经济冒进，比例失调的恶果。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职工人数、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对商品粮需求大幅度增加，征购任务的压力沉重，而农业生产难以适应，上层压，基层骗，最终牺牲的是农民的口粮。

——“五风”盛行之日，是党风、政风、文风、干部作风败坏之时。上层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实情，面对巨大的公共危机而无从察觉。基层唯书唯上，惟命是从，只要上级喜欢，只要保住乌纱，面对濒临死亡的农民，依然无动于衷。

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不能忘却这沉重的教训。

（作者孔宪瑞：时任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

李先念副总理来我场视察

郭银朝 口述/王喜超 整理

回忆三十多年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八七村的教导，一直激励着八七村的农民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不断前进。

一九五八年我担任和尚桥乡“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场长（即八七村青年试验场）。四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和青年试验场的王兴，王红孩、王玉枝、马子臣，马焕成等同志正在麦田中拔草，突然试验田东头停下了一辆黑色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直朝我们劳动的地点走来。当他们走到离我们约有五六步时，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吕炳光同志。我们几个同志都停止了干活，向他们围拢过去。

吕炳光书记开口问我们：“谁是队长郭银朝？”

我走到他跟前答：“我是。”

吕炳光书记指着另两位同志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李先念副总理，这位是我们河南省委吴芝圃书记，他们来你们这里看一看，你把情况介绍一下。”

当时，我因心情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李副总理连声称赞说：“这麦子长得好。”并开口问我：“你们这个试验场有多少亩地？多少人管理？象这样的麦苗亩产能打多少斤？”我回答说：“这是和尚桥乡‘五四一社’青年试验场，共有300亩地，43人管理。今年麦苗长势好，估计一亩能打一千斤左右。”

李副总理又问，“你说打一千斤有什么根据？”

我答，“今年麦苗分蘖好，株数比任何一年都多，出头率也相应的高了。估计将来要成75万个穗，少说也会成73万个穗，测算能打一千斤。”

李副总理笑了笑说：“你讲的还有些根据。”接着他又问：“你们是怎样管理的？”

我说：“这地是人工深翻了一尺多，然后分层施肥，春节前又用人粪尿普遍泼了一次，开春后又加施了一次尿素。”他听后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措施好，可以实现一千斤，但还要加强管理才行。毛主席在农业方面提的‘八字宪法’就有‘管’嘛。”说着他就随便地蹲在麦田里，象一个熟练的

老农，一手拨着麦棵，一手拔着小草，然后站起来说，“好哇，你们管理得不错，实现一千斤有根据有基础，鼓鼓劲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他又和我们几个一一地握了握手，结束了这次难忘的视察。我们望着公路上飞速奔驰的轿车，回味着李副总理的谆谆教导，心情无比激动，几个人一致表示，下决心搞好麦田管理，争取夏季农业大丰收！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整理者王喜超：曾任长葛市侨联主席)

回忆两次见到邓大姐

本凤 口述/张艳翠 整理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大姐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痛。30多年前两次见到邓大姐的情景，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1957至1958年间，我先后任古桥乡辛庄大队生产大队长、“三八妇女农场”场长等职。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由于我积极率领广大群众大搞水利建设、工具改革和科学种田，适时播种，合理密植，在农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上级党、政府和群团组织的关怀，荣幸地多次出席县、地、省和全国的劳模会议。

第一次见到邓大姐

1958年10月的一天，县妇联通知我，全国妇联来人了，让我到县上去接。我把工作简单安排了一下，于上午八点多钟步行赶到县妇联（今老城）。县妇联主任李秀玲对我说：“全国妇联来人了，要到你那里看看‘三八妇女农场’，看你是不是真劳模。你要以农村普通妇女干部的姿态说话，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并安排电话通知农场，来一辆人力架子车，接全国妇联的来人。

李主任嘱咐后，领我去见全国妇联来人。到了县妇联办公室，李主任介绍说：“她是全国妇联的同志，这位是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场长本凤同志。”全国妇联来人和我热情地握握手，说：“你是本凤同志。”我说：“我是本凤。”又说：“我想到你那里去看看。”我说：“欢迎！”当时，我不知道全国妇联来人的身份，她只身一人，也未带工作人员，李主任没有具体介绍，也不好多问。仔细看全国妇联来人，她身材不高，胖胖的，剪短发，穿着一身朴素的兰衣服，举止大方，说话和气，年龄五十多岁，身体健康。

那时农村条件很差。县城距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30多里路。架子车来到后，车上只铺了一张用高粱叶编的草苫子，让全国妇联来人坐上，我步行。人拉架子车走得快，我在后边紧跟上，一同回到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时，已到中午时分。稍休息了一会儿，就召集古桥村党支部书记吴

群，乡团委书记、包场干部魏丙灿等人，先汇报了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的情况。午饭安排得十分简单，那时农村是大食堂，场里伙上炒了两个自己种的蔬菜，主食是食堂的杠子馍。端不出好饭好菜招待客人，我很不好意思，但全国妇联来人却很客气，说吃得很好。

午饭后，全国妇联来人就催着去看农田，由农场副厂长李根昌，郭奎元，团支部书记石拴妮，妇女主任贾素真和我陪同，看了农场大田和卫星试验田，边看我们边作简单汇报。来人不多说话。走到卫星试验田时，她边看边记。因为卫星试验田一亩一方，都挂着牌子，品种、播种时间、单产、负责人，都写得清清楚楚。回到办公室后，她说：“三八妇女农场是妇联会的一面旗帜，你们要好好干下去，获得更大更好的成绩。”她不多停，又让她坐上架子车，我跟着把她送回县妇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当时还不知道她是邓大姐。

过了几天，我到外县参观回来，见到了李秀玲主任。她给我说：“前几天全国妇联来人是邓颖超，是她临走时才告诉我的。”当我知道是邓颖超大姐亲自视察我们古桥乡“三八妇女农场”时，我的心情激动得几夜难以入眠。回想与邓大姐一天的相处中，她那只身一人，深入农村，不怕劳累，不怕辛苦的忘我工作精神；她那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她那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越想越使我激动和崇敬。

第二次见到邓大姐

1958年底，我荣幸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姓氏笔划编排我坐在第三排第一个座位上。会议开始那天，听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大家心情激动，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一会儿，领导人从前边侧门进来，会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彭德怀元帅走在前边，接着是由两位同志搀扶着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由于我的心里特别想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着看着，排在第三位的邓颖超大姐已快步走到我的跟前，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本凤同志，你好！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叫邓颖超，前些时去过你那个地方。”我连声说：“认识，认识。邓大姐好！”这时，蔡大姐刚走过我坐的一排，邓大姐又赶紧对蔡大姐介绍说：“这位是河南长葛的本凤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蔡大姐又与我亲切地握手。接见后，会议开始。大会宣布，原定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因为毛主席工作很忙，由彭德怀元帅负责召开这次会议，并向大

会作报告。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邓大姐。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的邓大姐，对一位农民，农村的基层干部，在一次未公开身份的接触之后，心里能够记住我，又在那样隆重的场合，用那样难忘的方式，与我热情握手，亲切问候，并主动向蔡大姐介绍，蔡大姐又与我亲切握手，使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许多多。

我两次见到邓大姐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我遵循邓大姐的教导，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坚持在农村干了30多年。领导上几次给我安排工作，我都婉言谢绝了。直到1989年，我已经50多岁了，领导上看我年龄大了，关心我，又将我安排到县城工厂当工人。尊敬的邓大姐，您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您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工人农民的心中，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奔向小康，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整理者张艳翠：曾任长葛市妇联副主任)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黄河集团公司

张振强 路志纯

2009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等陪同下莅临我市黄河集团公司视察工作。

贾庆林一行在该公司研发中心广场下车后，与迎候在那里的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和该公司董事长乔秋生等握手致意。乔秋生董事长引导贾庆林一行来到研发中心大厅，结合展示的产品进行介绍。贾庆林主席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陈列的产品，关切地询问了许多问题。

接着，一行人来到金刚石生产二部的车间、选型厂和金刚石质检部，贾庆林一边看一边询问金刚石的合成工艺、原料成本、压机吨位、大颗粒单晶的生产情况，乔秋生一一作答。在筛选车间，贾庆林看着正被筛选的金刚石产品说：“这小小的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啊！”接着，贾庆林又问公司有多少研发人员，乔秋生告诉贾庆林主席，公司现拥有330多名研发人员，有一个研发中心和博士后科研站，我国的金刚石标准也由我公司牵头制定。乔秋生结合科技投入、自主创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不少企业认为科技投入是个大窟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大窟窿，越投你才有新技术、才有新的产品出现。如果不更新换代，就没有新技术。像这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公司的销售额恐怕最低要缩水一半。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公司的单晶产品虽然减少了，但是聚晶产品上来了，这就是技术的力量！我认为不吃亏。我们始终围绕着主业，拉长产业链，做好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产品。”

贾庆林听完汇报后，高兴地握住乔秋生的手说：“这就是民营企业！（旁边，有领导插话：他是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获得者！）你是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获得者，好啊！继续努力！乔秋生，我记住你这个名字，不简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全称是“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建设者”，全国政协曾在2006年进行过评选，乔秋生当选。在当年的12月20日，乔秋生同其他99名当选者一起受到贾庆林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就是为什么有旁边的领导提及此事。这也是为什么贾庆林主席对乔秋生会有“好啊！继续努力！乔秋生，我记住你这个名字，不简单！”的那番亲切的话语。

（作者张振强：河南黄河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部部长；路志纯：见前注。）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到黄河集团公司视察

路志纯

2003年4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莅临我市黄河集团公司视察，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王明义、许昌市委书记刘春良、市长毛万春，我市市委书记朱恒宽、市长赵正风等陪同。陪同视察的黄河集团公司领导有董事长乔金岭、总经理乔秋生、金刚石公司总经理刘建设等。

回良玉副总理视察了金刚石六厂、七厂、金刚石制品公司、日方管理的联合旋风公司和金刚石检测室，对该公司的金刚石、金刚石机具产品表现出极大兴趣，不时询问情况。对该公司由一个3000元起家的民营小厂发展成如此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对乔金岭董事长艰苦创业精神、企业家的眼光和胆略赞扬有加。

视察过上述单位后，回副总理来到会议厅，听取了乔秋生所作的专题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回副总理对该公司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赞扬黄河集团公司为民族工业争了光，赞扬黄河集团是“中原大地的一个亮点”、“一个闪光点”，“不但富了自己，而且带动周边，同时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对黄河集团的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在企业方面总结了很多发展经验，比如刚才讲到的‘两个依靠’‘五个创新’。民营企业要靠党的政策，要走出一条路来，更要依靠科技和人才。‘五个创新’谈得好，观念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等带动产品创新。”

回副总理勉励该公司不要满足于“在中国做霸主，要瞄准世界上最强的”，要“取得更大成绩”。

回副总理同乔金岭、乔秋生合影留念后，亲切握手告别。视察历时一个多小时。

（作者路志纯：曾任长葛市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

康生视察长葛三中

刘福祥

195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视察了长葛三中。

长葛三中是一所18个教学班的初中。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三中的学生都不在校学习，一部分师生到禹县上山大办钢铁，一部分师生在官亭炼焦，一部分师生在无梁办水泥厂。当时，我在禹县无梁办水泥厂，团县委书记王家瑞通知我，让我立即回校。向康生汇报工作。（校长魏光轩到北京开会去了）

康生是从禹县鸠山大学视察后到三中去的，陪同去的有中共河南省文教部长张柏园、县委文教部吕成文同志，去后在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三中的部分师生。当时，我们向康生汇报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师生大办钢铁等方面的情况，座谈会开得比较活跃，随问随答。我记得说到教师授课情况时，我们谈“十五天讲完一年课”，“45天初中就可毕业”，当时。康生反问：“能保证质量吗？”我们说：“能，没有问题”。当时，康生主张，一个学校小而全，从幼儿园办到大学，提出口号是：大（大学）高（高中）中（中学）小（小学）幼（幼儿园）的办学体制。座谈会结束后，我们一同送领导出了校门。

（作者刘福祥：曾任长葛一高党总支书记）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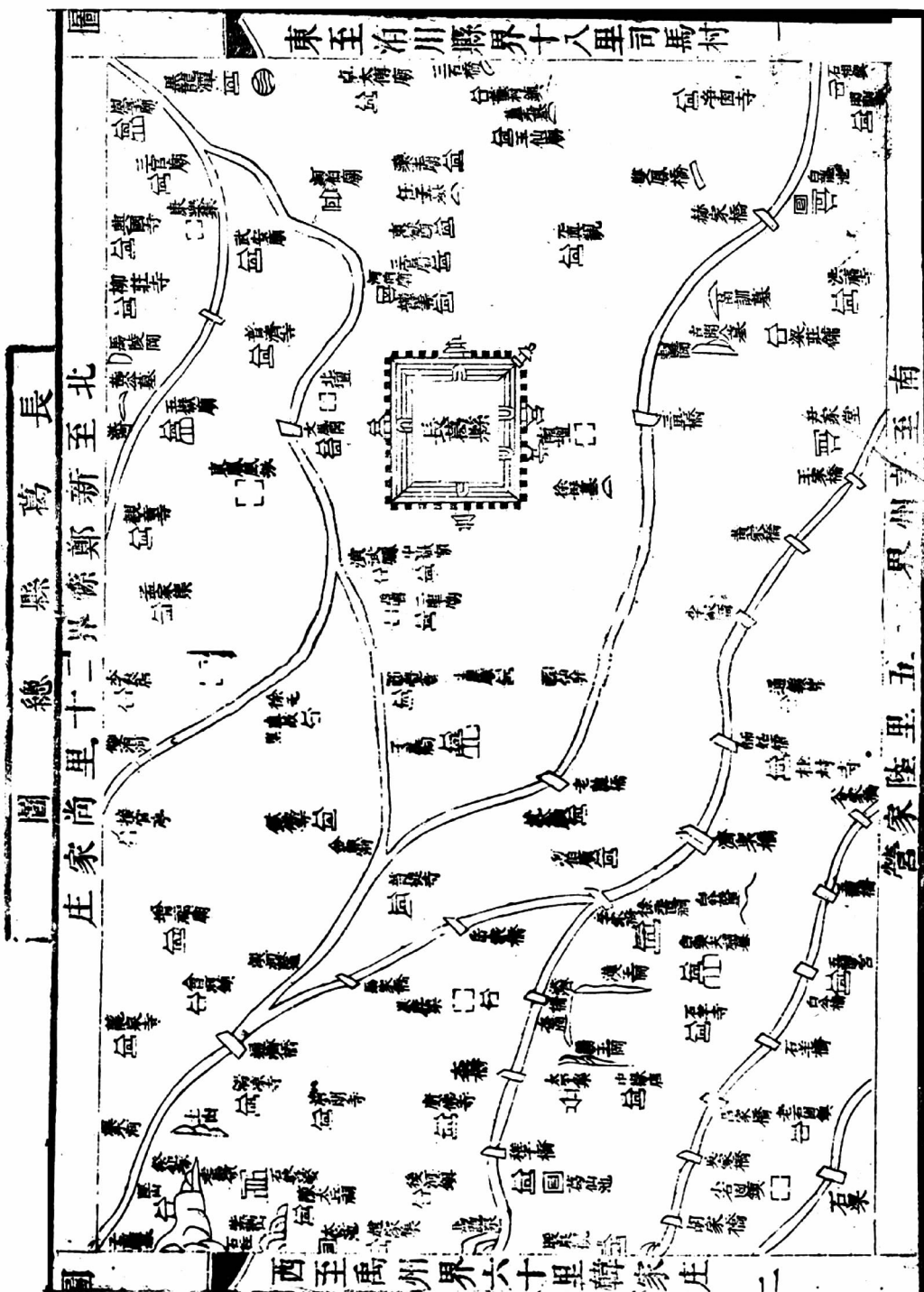
李立三与长葛

1927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由韩文治、高介民（省农运特派员、许昌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负责人）陪同，赴石固考察农民运动。陈子林、王松年汇报农运情况。石固东肖庄人肖光宇，时为石固南校教师、农协会会员、农民夜校教师，当时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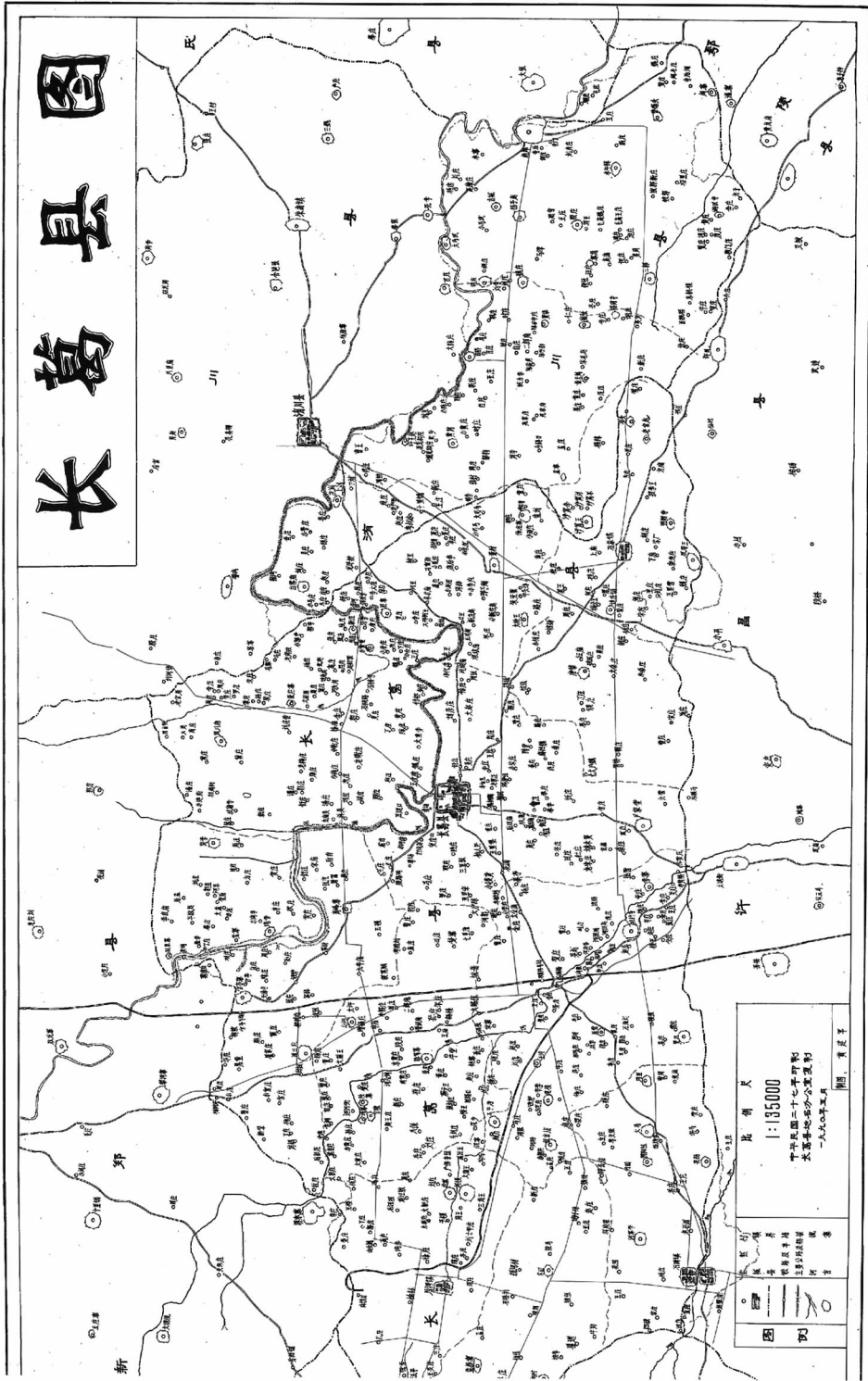
（王铁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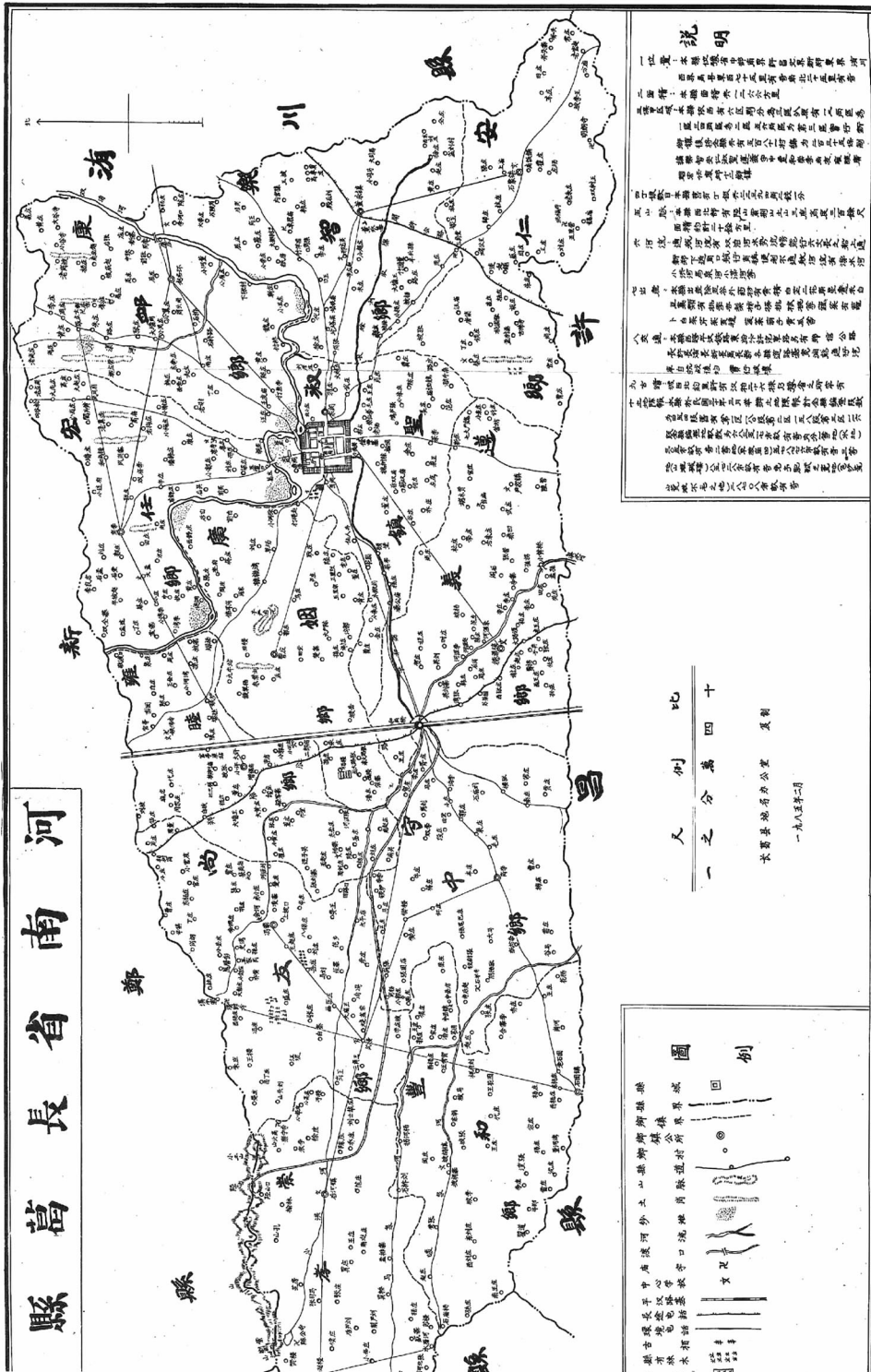
第二編

建置 地名 人口



長葛縣總圖





说明

一、本图系根据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中国行政区划图及地方志等资料编制而成。图中所示之行政区划，均系根据最新公布之资料编制。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二、本图之比例尺为1:400,000。图中所示之距离，均系直线距离。实际距离，可能因道路弯曲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三、本图之编制，旨在提供一般之参考。如有需要，请向相关机构索取详细资料。

四、本图之编制，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本图之编制，参考了以下资料：
 1. 中国行政区划图
 2. 河南省行政区划图
 3. 长葛县志
 4. 长葛县统计年鉴

六、本图之编制，旨在提供一般之参考。如有需要，请向相关机构索取详细资料。

七、本图之编制，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八、本图之编制，参考了以下资料：
 1. 中国行政区划图
 2. 河南省行政区划图
 3. 长葛县志
 4. 长葛县统计年鉴

九、本图之编制，旨在提供一般之参考。如有需要，请向相关机构索取详细资料。

十、本图之编制，得到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比例尺 1:400,000

长葛县地名为公里

及制

一九五二年二月

图例

县界 县界

乡界 乡界

村界 村界

公路 公路

铁路 铁路

河流 河流

湖泊 湖泊

村庄 村庄

学校 学校

工厂 工厂

商店 商店

桥梁 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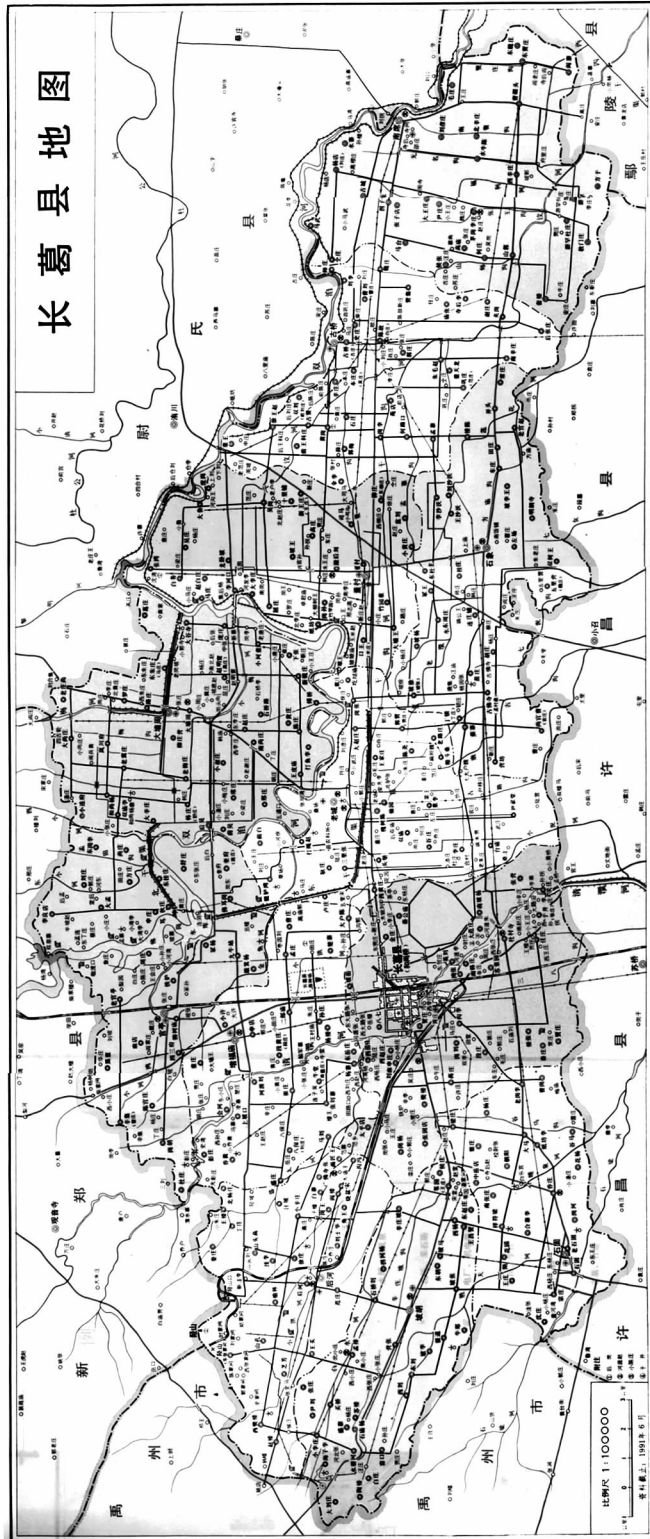
渡口 渡口

纪念碑 纪念碑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长葛市建置沿革简表

刘都旺

朝代	时间	名称	治所	隶属	备注
春秋	鲁隐公五年 (前 718 年) 前建	长葛邑	长葛邑①	郑国	长葛邑传为郑武公(前 770 年~前 744 年在位)汤沐邑,前 547 年为子产采邑。《春秋·鲁隐公五年》“秋,宋人伐郑围长葛”始见其名。
战国	韩哀侯二年 (前 375 年)	长葛邑	长葛邑①	韩国	韩灭郑。
	魏惠王二十年 (前 350 年) 前建	长社邑	长社邑②	魏国	《中国历史地图集》长社城属魏。
秦	秦王政二十六年 (前 221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前 230 年秦置颍川郡
西汉	高祖刘邦元年 (前 206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今古桥、南席汉初属许县,宣帝神爵三年(前 59 年)置新汲县,古桥、南席属新汲县。
新朝	王莽始建国 元年(9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天凤元年 (14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左队	是年,王莽改颍川郡为左队。
东汉	光武帝建武 元年(25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改左队为颍川郡
三国 (魏)	魏文帝黄初 元年(220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西晋	晋武帝泰始 元年(265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朝代	时间	名称	治所	隶属	备注
东晋 及十六国	晋元帝建武元年 (317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后赵石勒七年 (325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长社属后赵领地
	前燕建熙五年 (364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长社属前燕领地
	前秦建元六年 (370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长社属前秦领地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384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长社复为东晋所有
南北朝	宋武帝永初元年 (420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北魏泰常八年 (423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川郡	长社为北魏领地
	东魏天平元年 (534 年)	长社县	长社城	颍州 颍川郡	东魏建, 长社归东魏所有。时置颍州。长社城是长社县、颍川郡、颍州治所。
	东魏武定七年 (549 年)	长社县	颍阴 (今许昌市)	郑州 颍川郡	武定五年 (547 年) 西魏将王思政入据颍川, 武定六年 (548) 东魏高岳攻王思政于颍川, 武定七年 (549 年), 高岳攻占颍川, 王思政降东魏。因长社城被毁, 长社县治移治颍阴。改颍州为郑州
	北齐天保元年 (550 年)	长社县	颍阴 (今许昌市)	郑州 颍川郡	东魏亡, 北齐建, 长社属北齐。天保四年 (553 年) 废颍阴, 并入长社。
	北周建德六年 (577 年)	长社县	长社 (今许昌市)	许州 颍川郡	北周灭北齐, 长社归北周, 改郑州为许州
隋朝	文帝开皇三年 (583 年)	颍川县	颍川 (今许昌市)	许州	是年, 罢郡, 行州县制。废颍川郡, 改长社县为颍川县。

朝代	时间	名称	治所	隶属	备注
隋朝	文帝开皇六年 (586 年)	长葛县	长箱城 (今老城 镇), 后 称长葛城。	许州	是年, 析颍川县置长葛 县。颍川县 (长社县)、 长葛县分城而治。长箱 城为东魏武定七年高岳 所筑, 初以车箱为楼, 故名长箱城。
	文帝开皇 十六年 (596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长葛东南部 (今石象一 带) 属蔡坡县, 大业二 年 (606 年) 废蔡坡县。
	大业三年 (607 年)	长葛县	同上	颍川郡	改许州为颍川郡
唐朝	高祖武德 四年 (621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改颍川郡为许州
	太宗贞观 元年 (627 年)	长葛县	长葛城	许州	撤消新汲县, 地分属尉 氏县、新郑县。今古桥、 南席地属尉氏县。
	玄宗天宝 元年 (742 年)	长葛县	同上	颍川郡	改许州为颍川郡
	肃宗干元 元年 (758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改颍川郡为许州
	德宗贞元 十年 (794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忠武军	
五代	后梁开平 二年 (908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匡国军	改许州忠武军为许州匡 国军
	后唐同光 元年 (923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忠武军	复改许州匡国军为许州 忠武军
	后晋天福 元年 (936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忠武军	
	后汉天福 十二年 (947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忠武军	
	后周广顺 元年 (951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忠武军	
北宋	太祖建隆 元年 (960 年)	长葛县	长葛城	许州	
	神宗元丰 三年 (1080 年)	长葛县	同上	颍昌府	升许州为颍昌府

朝代	时间	名称	治所	隶属	备注
南宋	高宗绍兴十年 (1140 年)	长葛县	同上	颍昌府	长葛为金占有
金朝	海陵王贞元元年 (1153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昌武军	改颍昌府为许州昌武军
	宣宗兴定二年 (1218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昌武军	置洧川县, 今古桥、南席地属之
元朝	文宗至顺元年 (1330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改许州昌武军为许州
明朝	太祖洪武元年 (1368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	
清朝	雍正二年 (1724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直隶州	清初沿明制, 属许州。是年升许州为直隶州。
	雍正十一年 (1733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直隶州	于石固置石梁县, 乾隆六年 (1741 年) 二月裁撤。
	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长葛县	长葛城	许州府	改称许州府
	乾隆六年 (1741 年)	长葛县	同上	许州直隶州	
中华民国	民国二年 (1913 年)	长葛县	同上	开归陈许郑道	3 月 1 日, 改称豫东道, 翌年称开封道
	民国十六年 (1927 年)	长葛县	同上	中区第二行政区	是年废道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年)	长葛县	同上	第一行政督察区	设行政督察区
	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年) 3 月	许西县尉洧县		许西县属豫西五专区, 尉洧县属豫皖苏五专置	两县治所不定
	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年) 9 月	许西县长洧县	长洧县治长葛城 (今老城镇)	同上	尉洧县分为尉氏县和长洧县
	国民三十七年 (1948 年) 12 月	长葛县	长葛县城 (今老城镇)	豫西五专区	长洧县、许西县撤销, 恢复长葛县建制。
民国三十八年 (1949 年) 2 月	长葛县	长葛县城 (今老城)	许昌专区	豫西二、五专署合并, 建立许昌专区。	

朝代	时间	名称	治所	隶属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至1969年	长葛县	长葛城 (今老城) 和尚桥 (1960年10月县政府迁至和尚桥)	许昌专区	1954年8月,洧川县并入长葛县,洧川、南席、古桥、朱曲、韩佐、大马六个区并入长葛。1965年将洧川、朱曲、大马、岗李四个区划归尉氏
	1969年至1986年2月	长葛县	和尚桥	许昌地区	
	1986年2月至1993年12月31日	长葛县	和尚桥	许昌市	
	1993年12月14日	长葛市	和尚桥	许昌市	撤县设市

(作者刘都旺:曾任长葛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长葛县历史沿革

长葛县地处中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有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文化遗址多处。其中石固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现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而证实，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为创造中华文明历史作出了一定贡献。长葛实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长葛，相传为远古葛天氏部族聚居的地方。后人思永其泽，取名长葛。又传在创邑时，有葛条附树，故名。唐、虞、夏、商史无记载，直至周朝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始见于史。据《春秋》记载，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时长葛为郑武公之汤沐邑。

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长葛属韩国。未几魏伐韩，长葛为其所夺，遂属魏。时以社（社稷坛）中树暴长，改名长社。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客卿胡伤攻魏，取长社。秦王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为秦所灭，以其地置颍川郡，治阳翟（今禹州市），长社为县，属之。

汉兴，长社县属豫州刺史部颍川郡。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改颍川郡为左队。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恢复颍川郡，长社归属仍旧。

三国魏、西晋，长社均属豫州颍川郡。

东晋十六国时期，长社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秦所占，仍属豫州颍川郡。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十一月，北魏周几袭许昌，长社属北魏颍川郡。因许昌城毁，颍川郡治迁长社。东魏天平初（约公元534年），长社又为颍州州治。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因长社城被水所毁，州、郡治均移颍阴（今魏都区），改颍州为郑州，长社属郑州颍川郡。北齐废颍阴县入长社。北周改郑州为许州，长社属许州。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郡，行州、县制，改长社县为颍川县（治今魏都区），属许州。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析置长葛县（治所在今老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行郡、县制，改许州为颍川郡，长葛

县属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颍川郡为许州，长葛县属许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许州为颍川郡（隶河南道）。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颍川郡为许州。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改许州为忠武军，长葛县归属相沿。

五代后梁改忠武军为匡国军。后唐复改为忠武军。后晋、后汉、后周因之。长葛归属无变化。

宋元丰三年（1080年），升许州为颍昌府（隶京西北路），长葛县属之。

金改颍昌府为昌武军（隶南京路），长葛县属之。

元改昌武军为许州（隶行中书省汴梁路），长葛县属之。

明洪武初，长葛县仍属许州。

清沿明制，许州仍为直隶州。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许州为府，乾隆六年（1741年），复为直隶州，长葛始终属之。

1912年，废州改道，长葛属河南省豫东道。1913年属开归陈许道。1914年长葛属开封道。1928年废道改区，长葛属中区第二行政区。1932年，长葛县属河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专署驻郑州。1947年10月，豫、皖、苏边区建立尉洧县，长葛县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归其管辖，12月13日，华东野战军三纵九师解放长葛。1948年3月，豫西行署建立许西县，管辖长葛县平汉铁路以西地区。9月豫皖苏边区五地委设立长洧县。10月，中原野战军进驻县城。11月，长洧县宣布成立，治所在今老城。12月1日，撤销长洧县和许西县，恢复原长葛县建制，属许昌专区。1954年8月，郑州专区的洧川县并入。1965年8月，将县东北部的洧川、朱曲、大马、岗李4个区以双洎河为界，划归尉氏县。1969年属许昌地区。1986年撤区改市，长葛县属许昌市。

葛天氏传说申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选

葛天氏文化研究会

（一）项目简介

葛天氏是传说中与伏羲氏、神农氏齐名的我国远古时期重要的部族首领，是著名的神话英雄，是重要的创世大神和文艺大神，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南省长葛市是传说中葛天氏部族的繁衍生息之地，至今仍生活着相传为葛天氏后裔的葛姓居民。明正德十二年车明理撰写的《长葛县志》、清乾隆十二年阮景咸撰写的《长葛县志》均载“长葛为古葛天氏之墟，其得名实始见于春秋，逮至于今盖已两千余岁矣”；“长葛，盖葛天氏故址也，后人思永其泽，故名曰长葛”。迄今流传着大量与葛天氏相关的民间传说，留存着大量相关“遗迹”、祭祀仪式。

当地葛天氏传说与民间信仰融为一体，成为当地岁时节日、礼仪、禁忌等重要文化生活内容；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既是祖先神又是保护神，是水神、山神、树神，主宰地方安康、五谷丰欠，许多地方以葛天氏传说内容为地名；地方葛姓民众传说为葛天氏后裔，有固定的祭祀时间、地点与特定的仪式，表现出独有的祖先崇拜。

葛天氏传说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对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强化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团结海内外华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史、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民族艺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调节民族情感、增强和提高民族道德情操、维系民族传统、整合民族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历史久远，世事沧桑，许多保留着有关葛天氏大量民间记忆即所谓“能讲‘古话’”的老人，绝大多数已相继谢世，民间记忆越发珍惜；多数历史遗迹已湮灭无存，严重削弱弱化着民间记忆；相关的音乐舞蹈、祭祀活动，当代人已知之甚少，亟待挖掘。